

李仰松 著

民族考古学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TREATISES ON ETHNOARCHAEOLOGY

by

Li Yangsong

Science Press

1 9 9 8

民族考古学论文集

李仰松 著

科学出版社

1998

内 容 简 介

本书论文是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为基础,结合民族志社会历史调查材料进行综合研究的部分成果。它是将考古学(原始社会考古)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借助当代有关民族社会历史考察素材和其他有关学科中的研究成果进行专题研究的一种尝试,目的是复原中国的史前社会历史。

本书对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艺术和农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可供历史、考古、文物、宗教、艺术等专业人员和其他爱好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李仰松著. -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ISBN 7-03-006415-1

I. 民… II. 李… III. 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K87 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799 号

1998.5.5

考古书店

No. 0014095

责任编辑 陈菊华 张玉梅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8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 × 1092 1/16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3/8 插页:17

印数:1-1 400 字数:307 000



作者近照

目 录

中国民族考古学及有关问题——代序	(1)
考古学与有关人文学科的关系	(7)
学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1)
“新考古学”与国情	(14)
民族学调查与考古学研究的关系	(16)
我国原始社会生产工具试探	(20)
云南省西盟佤族制陶概况	(28)
我国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	(37)
仰韶文化慢轮制陶的研究	(44)
原始制陶工艺的研究	(55)
佤族葬俗对研究史前人类葬俗的启示	(64)
仰韶文化的瓮棺葬	(69)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编年与社会性质	(76)
濮阳蚌塑龙虎墓的发现与研究	(85)
中国古代的军事民主制	(92)
中国岩画探秘	(100)
内蒙古、宁夏岩画生殖巫术析	(103)
广西左江宁明花山崖壁画试探	(112)
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地画	(119)
仰韶文化婴首、鱼、蛙纹陶盆考释	(125)
柳湾出土人像彩陶壶新解	(129)
云南省西盟佤族的鸡骨卜	(131)
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	(136)
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双连杯”和“三耳杯”	(140)
我国谷物酿酒起源新论	(147)
西盟马散佤族村落对研究姜寨遗址村落的启示	(157)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	(169)
王湾遗址有关学术问题的探索	(173)
研究我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些思考	(184)

附录一 云南省西盟佤族概况	(188)
附录二 《民族考古学》教学大纲	(198)
后记	(205)
Synopsis	(206)

云南省西盟佤族概况图版目录

图版壹	西盟佤族自治县和大马散寨
图版贰	阿佤山云海
图版叁	大马散寨村落
图版肆	佤族村落寨门
图版伍	佤族生产工具与农耕
图版陆	佤族农耕
图版柒	佤族收获谷物
图版捌	佤族收获谷物
图版玖	佤族的房屋结构
图版壹零	佤族的房屋结构
图版壹壹	佤族的房屋结构
图版壹贰	佤族野外市场交易
图版壹叁	佤族纺织
图版壹肆	佤族的副业生产
图版壹伍	佤族酿酒业
图版壹陆	佤族“猎首”活动之一
图版壹柒	佤族“猎首”活动之二
图版壹捌	佤族“猎首”活动之三
图版壹玖	佤族的木鼓房、木鼓和象脚鼓
图版贰零	佤族剽猪剽牛做鬼
图版贰壹	佤族“砍牛尾巴”和做“豹子鬼”
图版贰贰	佤族放置牛头骨和猪下颚骨处
图版贰叁	佤族的墓葬(标记)
图版贰肆	佤族架置水槽和背水
图版贰伍	佤族食具与饮食
图版贰陆	佤族服饰
图版贰柒	佤族服饰
图版贰捌	佤族服饰
图版贰玖	佤族服饰与舞蹈

- 图版叁零 佤族文身及作者与佤族合影
图版叁壹 作者与佤族在一起(1956年)
图版叁贰 作者与佤族在一起(1956年)

中国民族考古学及有关问题

——代序

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依考古学(指传统考古学,以下均同——笔者按)所提出的问题,通过近现代民族群体的行为及其有关材料与考古物质遗存相类比、验证,研究阐释其文化内涵,以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面貌的一门学科^①。其研究方法,是用“类比—假设—验证”和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并在实践中反复验证,不断完善,以获得符合实际的正确的结论。

一、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顾颉刚、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等老一辈学者在其著作中就已利用民族志有关材料阐释中国史的某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学界普遍学习马列主义,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教学与科研。1956年,一些学者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八省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笔者有幸作为云南分组的成员,赴云南西盟佤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编写有《佤族社会历史调查》^②。在实地考察中,笔者曾有目的地搜集佤族制陶技术的若干材料,探索我国新石器时代人们制作陶器的过程,这是考古学与民族志在学术问题上相结合的一次尝试^③。60年代以后,我国用民族志有关资料阐释或探讨考古学中某些学术问题的文章日益增多^④。

然而,民族考古学形成一门学科,正式被介绍到我国学术界是80年代初期。我国学界对这门学科的内涵、定义曾有过热烈的讨论,主要论文有梁钊韬、张寿祺:《论“民族考古学”》(1983年)^⑤,容观复:《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民族考古学”介绍》(1984年)^⑥等。我国各报刊也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讨论民族考古学的论文和评论^⑦。迄今虽然各家对民族考古学的涵义还有不同见解,但是作为新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的民族

① 参见 I. Hodder, *Present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y*, London, B. T. Batsford, 1982, pp. 31—40. D. Stiles, “Ethnoarchaeology: A Discussion of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May 12(1977), pp. 87—89.

② 李仰松等编著:《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 李仰松:《云南省佤族制陶概况》,《考古通讯》1958年2期。

④ 林声:《云南永胜县彝族(他鲁人)“羊骨人”的调查和研究》,《考古》1964年2期;宋兆麟:《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住俗——兼谈对仰韶文化葬俗的看法》,《考古》1964年4期。

⑤ 梁钊韬、张寿祺:《论“民族考古学”》,《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

⑥ 容观复:《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民族考古学”介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3期。

⑦ 对新考古学有关问题,80年代末曾在《中国文物报》第三版开展过讨论,如丁乙:《民族志类比法的原则》(1989年2月17日);丁一、徐明:《关于民族考古学的对话》(1989年7月7日);何弩:《也谈民族志考古学的定义与方法》(1989年8月18日);陈星灿:《民族考古学之我见》、《新考古学述略》(1989年9月22日、1990年1月4日);李仰松:《略谈“新考古学”与国情》(1990年1月4日);陈淳:《谈谈民族考古学》、《新考古学溯源》(1990年5月10日,1992年7月19日)等等。

考古学这一学科,已为我国学界所接受^①。

二、中国考古学概况

我国以田野考古学为基础的考古学,其前身是金石学^②。由金石学发展来的古器物学、古文字学、古钱币学、古文献学等,也是构成我国考古学不可缺少的因素,30年代以前,我国学者裴文中、李济、梁思永、夏鼐等赴西方留学,遂将国外田野考古技术引进国内,在他们主持发掘的北京周口店、安阳后岗、小屯殷墟、历城城子崖、宁定阳洼湾等古代人类遗址和墓葬中,西方国家的考古方法,如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整理等技术已运用到我国的考古工地上,在我国考古实践与西方考古技术的结合和运用中作出了新的贡献,为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方法,使中华民族文化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它在逐步扩大,形成了不可抵挡的新文化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曲折的阶段:50年代初期,设立了文物考古机构,开始在高等院校设置考古专业,培养考古文物人才。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社会曾受到“左”的干扰,田野考古工作比较粗糙,真正的专业人员不多。6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浩劫,我国考古事业和各项事业一样受到严重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步入正轨,我国文物考古工作持续开展,各地着重于本地区古文化区系类型和文化谱系、性质、年代的探讨。到80年代后期,我国考古工作已显示出本地(省、区)的优势和文化特色,各地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如陕西省:姜寨仰韶文化村落遗址^③、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发掘^④;河南省:平粮台河南龙山文化城址^⑤、偃师商城^⑥;山西省:陶寺龙山文化墓地^⑦、曲村晋文化墓地^⑧;山东省:龙山文化城址^⑨、西朱封龙山文化墓地^⑩;辽宁省:旧石器时代金牛山人化石^⑪、红山文化牛河梁庙、坛、塚^⑫;内蒙古:兴隆洼遗址^⑬、园子沟窑洞式房屋^⑭;甘肃省:大地湾遗址^⑮;四川省:三星堆遗址^⑯;湖南省:城头山遗址^⑰;江西省:

① 容观复:《十多年来民族考古学研究述评》,《民族研究动态》1992年3期;张继焦:《读〈民族考古学初论〉札记》,《民族研究动态》1994年1期。

② 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86年。

③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编著:《姜寨——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编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6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⑧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7期。

⑨ 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7期。

⑪ 吕遵谔:《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及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2期。

⑫ 辽宁省文物考古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8期。

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0期。

⑭ 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见《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论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⑮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2期。

⑯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⑰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省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10期。

新干商代青铜器^①;浙江省:河姆渡遗址^②、反山良渚文化玉器^③;广东省:南越王墓^④;西藏:卡若文化^⑤,以及广西^⑥、云南^⑦、内蒙古^⑧、宁夏^⑨、甘肃^⑩、青海^⑪、新疆^⑫等地发现的岩画遗迹等等,举不胜举,培养了一批有专业知识和文物考古技能的骨干队伍,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为今后各省(区)文物考古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民族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

民族考古学与考古学是两个工作任务目的相同而研究手段不同的姊妹学科。二者研究的目标一致——都是复原人类文化历史、生存方式和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通常民族考古学的产生,是在考古学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前提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在研究过程中起互补的作用,但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一个时期以来,“新考古学”的部分学者,片面批评考古学“停留在对考古遗物进行描述、分类、编年的低层次上”、“过于陈旧”、“流于繁琐”等等。实为反对该学科固有的研究方法,甚至以新考古学取代考古学,这是不妥的。因为若无考古学的研究基础——弄清远古文化的编年顺序和来龙去脉,民族考古学就无从类比,它也难以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当然考古学在工作技术和研究方法上,在时代前进,科技突飞猛进的情况下,理所当然需要不断革新。回忆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教授,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两个学科(当时还不称民族考古学)的关系以人体作比喻:“史前考古学如同肋骨,民族学(当时指民族志调查材料——笔者按)如同皮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它才有生命力,二者缺一都是不完备的。”这个比喻生动、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阐述清楚民族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笔者继60年代研究的一个课题:“我国谷物酿酒的起源”^⑬之后,运用考古发掘材料与民族志有关资料相结合,二者通过类比、分析、多角度验证和推理演绎的方法,从而结论为谷物酿酒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⑭。

这种类比、假设、验证的程序,均以史前考古和民族志有关实物资料为起点(由已知探求其未知),在可比性条件下尽量多寻求一些论据进行诠释。如最早有距今八千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兴隆洼文化等,该文化中与酿酒有关的实物材料是稻谷、粟类和酿酒有关的各种酒器——小陶杯、“双连罐”(壶)。这些遗迹、遗物在考古发掘中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② 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

④ 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3期。

⑤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等:《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⑥ 覃圣敏等:《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王克荣等:《广西左江岩画》,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⑦ 汪宁生:《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⑧ 盖山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乌兰察布岩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⑨ 王系松等:《贺兰山岩画(拓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许成等:《中国宁夏贺兰山岩画拓片精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⑩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嘉峪关黑山古代岩画》,《考古》1990年4期。

⑪ 许新国、格桑本:《青海哈龙沟、巴哈毛力沟的岩画》,《文物》1984年2期。

⑫ 克由木:《新疆北部的岩画》,《文物》1962年7、8期;王柄华:《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新疆文物》1988年2期;苏北海:《新疆托克逊县科普加衣岩画》,《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2期。

⑬ 李仰松:《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考古》1962年1期。

⑭ 李仰松:《我国谷物酿酒起源新论》,《考古》1993年6期。

均有科学记录,其时空年代确凿。再以民族志有关资料进行类比与验证,其材料自然是越多越准确。笔者选择了我国保存原始社会形态较多的诸民族,如独龙族、傈僳族、怒族、高山族等,他们在远古前无阶级社会时期,均有谷物酿酒的历史,并且一直遗留至今,其专用的酒器中,还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双连杯”和大双耳杯(均为二人一器共饮的习俗),此可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互验证。

同时,还可从诸民族远古巫教——“交感巫术”中探寻其与谷物酿酒有关的论证材料,这同样可与史前考古发掘出的有关实物作类比研究。如我国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四坝文化和辛店文化中附有“壁虎”形象的陶器,经考证,应为当时专用的酒器。

此外,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的陶漏斗器^①,按其形制、功能和酿酒容器的组合关系考证,也是与酒器有密切关系的一种灌注用具。

据以上考古学与民族志有关材料的类比,归纳出四点意见,作为民族考古学可类比验证的规范例证。

第一,社会性质相同或同一社会发展阶段;

第二,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类物质文化;

第三,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类精神文化;

第四,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功能(人类生存方式)。

可见那些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物、遗迹与同样或相似类比条件的民族志资料相互验证,是最有说服力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那些古今共享的东西用怀特海德(Whitehead)的话来说就是“永恒的客体(eternal objects)”,而正是这种永恒的客体,构成了我们对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事件进行比较的基础。”^②通过类比分析和多方面验证,使考古学与民族志有关资料互相印证,各取所长,有利于疑难问题的解决。

应当指出,在各项类比中,科学发掘的考古资料至关重要,它具有决定意义的论证价值。而民族志中活生生的材料与其类比,可提示人们对研究考古资料中那些未知现象有所启迪。如若缺乏这种活的材料,那些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也难以“复活”。从此意义上说,有关民族志资料的借鉴和运用,是解开考古学中某些“哑谜的钥匙”。以上两学科的密切合作,相互类比、验证,可以起互补的作用。诚然,所研究的课题,必须根据考古与民族资料的新发现,在实践中不断去伪存真,充实完善。

四、中国民族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发展趋向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在长远的历史发展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各省、区的文化考古工作全面铺开,作为学界通常所关注的古文化区系类型的探讨与研究,几乎每年都有新进展。我国中原、北方、长江中下游和南方诸省区的古文化(史前至青铜

①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农安县元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89年1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庙底沟与三里桥》,39页,图二五,科学出版社,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福临堡遗址1984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6期11页。

② 南京博物院主办:《东南文化》1992年1期(总第89期)50页。

时代)历史编年谱系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它为今后拓展和其他有关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并且为新考古学的类比分析、验证等也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我国有丰富的古代民族史文献和经过各种社会历史形态发展过来的兄弟民族,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有各历史阶段的物质文化和古老的精神文化,因此,应用我国历史文献、民族志和有关资料阐释中国史前考古中的未知问题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①,尚有待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工作者的相互沟通,发展各学科的特长,以拓展学科间的合作,对民族考古学来说,更是责无旁贷,应努力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

如何提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水平,需要从考古学与民族学等诸方面因素中来考虑。就考古学方面说:要求出土遗物、遗迹真实可靠,地层、年代确凿无疑(有科学的田野记录档案材料);室内整理中确保认真,如遗物保管、清洗、写号、复原、分型、分式、绘图、填卡等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掺杂任何主观意识。此外,考古工作中尽可能采用新技术,如计算机、磁力仪、浮选法、痕迹分析、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等。对于探究考古遗址、遗物、遗迹中需要解释的问题,不同学科要密切合作。

就民族志资料说:在野外考察时,首先应选好被访人(视其所提供材料的权威性),可访问巫师、族长、有经验的老者;注意翻译人员的表语水平;重要事件、典故务必进行核对;统计数字要具体;典型材料有详细记录,包括测绘、摄影或录像、录音等,否则,离开调查现场则难以弥补,甚至成为终生的遗憾。

前面谈到我国考古学与民族考古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其工作基础和科研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般地说:我国中原、西北地区、辽宁、内蒙古和南方部分省(区)的考古工作已有相当好的基础,各地都有经科学发掘的一批古文化遗址、墓葬资料、均有立档和经挑选的典型实物标本。凡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遗物、遗迹都经过整理并发表过简报或正式报告。多数地区已基本建立了本地区古文化的“时空”谱系,此类地区有条件分出部分人力着手进行实验考古(或称模拟考古)与民族考古学的研讨工作。

我国考古学比较薄弱的省(区),一般说,那里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基础较差,甚至还有一些“空白点”,往往这类地区的古文化“时空”编年谱系还未搞清楚,如我国新疆、西藏、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地的文物考古工作做的较少,考古工作基础稍差,首先应集中力量搞好本地区的考古工作,但是有条件的部门(如民族研究所),可以抓紧本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考察与研讨工作。因为在祖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些后进的生产技术、生活资料、建筑方法、婚、丧习俗等,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下,可能很快就要变革了,当地文化科研单位领导要有远见卓识,应尽力设法搜集保存好那些珍贵的史料,否则,后悔莫及。根据我国不同省(区)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与条件,妥善规划好诸学科发展的任务是适宜的。

虽然我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比西方晚,大约 80 年代才逐渐为学界所关注,并且至今学界对民族考古学的理解还不完全一致,但是民族考古学对考古学的深入研究,其重要性是可以肯定的。我认为民族考古学成为“新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有其研究目标、方法和规范,其专业理论与研究方法是统一的。这支新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的趋向,有可能会拓展到更广阔的学科研究领域,如美术史、岩画学、巫教、生态学、建筑史、符号学、天

^① 李仰松:《略谈“新考古学”与国情》,《中国文物报》1990 年 1 月 4 日第三版。

文学等等,它还有待于我们不断地去开拓与创新。充分利用我国考古学和多民族遗留下的文化遗产与有关学科的密切合作(包括自然学科),是开展这门学科研究的优势和特色,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希望这门学科能迅速的成长起来。

(原载马启成、白振声主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考古学与有关人文学科的关系

考古学这一名称,系欧洲文字翻译而来。最初泛指古代科学,到 19 世纪初,又被泛指对一切古物和古迹的研究。

我国自 11 世纪初,北宋时期,吕大临著有《考古图》一书,是我国最早的考古书籍,主要研究古代的青铜彝器和石刻。以后,研究的范围陆续扩大,也研究其他一些古物,通常人们称其为“金石学”或“古器物学”。但古器物学研究的范围与目的,仍有其局限性。

今天我们所讲的考古学,其内容大体是指古代人类所遗留下的一切遗物、遗迹。考古学主要依靠田野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手段,用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若给考古学下个定义:是根据古代人类所遗留下的实物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考古发掘出的遗物、遗迹,主要指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遗留下的实物资料,如各类生产工具、武器和生活用具等等。遗物中也包括当时各种动、植物遗骨与籽种、果壳等。考古遗迹,主要指发掘出的聚落遗址及其相关的建筑遗迹和死者的墓葬等。建筑遗迹包括居室、窖穴、宫殿、庙坛以及各种手工业作坊等。还有岩壁画和地画,也是一种精神文化遗迹。

考古学研究以上人类遗留的各类文化遗存,均为不同时期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它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人类不同社会历史时代的传统文化。

考古学的功用

考古学科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的需要,它作为一门较年轻的学科,从小到大,至今为世人所注目。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的发展更有其特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充实祖国的历史文化。自有人类就有人类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仅凭史籍记载的文献资料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是困难的。因为史书中所记载的史实是有限的,错误或空、缺在所难免。在文字记载之前的史前社会,虽有一些神话传说作为研究的参考,但弥补其不足主要还是靠考古学所提供的实物资料。

第二、为研究历史提供实证材料。我国史籍多为历代文人所撰写,作者因受时代、历史背景诸条件的限制,多有其阶级偏见,历史事件的记录或则不详、或因观点有误、或被歪曲而造成混乱。它需要考古学与其他有关学科的协作共同进行分析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澄清是非,佐证史实的作用。例如过去外国学者曾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丰富的考古资料,说明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有自己文化发展的谱系编年与区系类型,充分证明中国文化是固有的,决不是外来的,该邪说不攻自破。

第三、为有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实物资料。考古学研究主要是揭示、复原古代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也为有关学科,如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以及农业史、畜牧史、陶瓷史、纺织史、建筑史、金币史、美术史、宗教史、天文史、中

外关系史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使这些学科的研究工作更为充实,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第四、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发扬民族传统文化。考古学可以为今天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考古发掘出的历史文物,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陈列、展览向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它对于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是一份具体、生动的历史教材。特别是当人们观赏到祖国一批批珍贵的历史文物时,自然会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古老、历史悠久,在其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有过辉煌的成就。就拿我国古代的科技来说,如商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秦代的金属防锈技术以及中国古代的瓷器、漆器、丝织、造纸等许多方面,都在世界文化史上居领先地位。

总之,考古学对于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它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历史内容非常广泛,它与有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它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关系更为直接。如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均可就古代遗物、遗迹所提供的有关资料进行研究和解释。下面就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关系简述如下:

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目前人类学这一名称在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使用较为混乱。50年代初期我们学习前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人类学科专指体质人类学,而民族学则专指对民族社会的研究。英、美的人类学有着广泛的内涵,它包括体质人类学、社会或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并且把社会学也归并入内。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在美国则称文化人类学,二者几乎等同于民族学。

当今我们习惯于把人类学视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中包括民族学与考古学等),从学科关系中知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早已结成联谊关系。它们在诸学科内容的研究中,通常都需要考古学提供更多、更新的实物资料。

关于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的关系:体质人类学分为人体学和人体测量学。人体学是研究人类机体的个体变异、两性差异、人类体质、年龄变化以及各种生物和社会条件对人体结构的影响等。它与医学的关系密切,对于人类体质发展规范、成长速度和对老年学的研究尤为重要。人体测量学是测量人体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和尺度,通过测量人体各部位形态指标和生理指标,用以探讨人体的类型、特征、变异和发展规律。人体测量有活体测量与骨骼测量两种,后者包括颅骨测量,也是研究人类体质发展和种族差异(或族属差别)的重要研究手段。

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古代墓葬时,应与历史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者相互配合,共同切磋,对研究古代民族的源流、迁徙、文化交流等诸方面将会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体质人类学对于人类起源学——古人类学的研究,所起的作用更是独特的,它们有较好的研究效果。另外,用颅骨复原古代人类不同群体的典型相貌,其效果也是独一无二的。